

# 澳門華商的黨商關係及其互動網絡構建

## ——以華商代表何賢為例

方木歡

**[摘要]** “黨商關係”是透視國家或地區政商關係及其變動發展的重要視角。在澳門不同歷史時期，不同華商代表與不同政黨之間進行聯繫而形成密切的互動網絡。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以何賢為代表的澳門愛國華商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多層次的密切互動，表現在與中共駐澳負責人、中共中央港澳事務負責人、中共高層領導人三個層次的往來與聯繫。澳門愛國華商在何賢帶領之下，通過舉辦慶祝新中國成立大會、戰爭時期搶送物資、協助解決國內“吃糧”難題等支持和擁護中共新政權。在澳門愛國華商陷入經濟危機之時，中共政權駐澳的經濟機構伸出援手予以解圍。研究澳門華商與政黨之間互動而形成的“黨商關係”，能夠為勾勒澳門回歸前的政治變化縮影提供重要的歷史角度。

**[關鍵詞]** 澳門華商 黨商關係 互動網絡 何賢

政黨是現代政治中的主導性力量，政黨政治已然發展成為現代政治的主要形態。透視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商關係及其變動發展，政黨與企業家或商人雙向互動構成的“黨商關係”是重要視角。在澳門，自1849年淪為葡萄牙殖民地之後，並無產生和存在正式意義上的本土政黨。因為澳門社團林立和數量龐大，社團構成澳門社會的顯著特徵，澳門被稱之為“社團社會”，成為學界切入澳門歷史研究的一個普遍視角。然而，近代澳門作為一塊緊連中國大陸而雖受澳葡政府殖民管治的中國領土，由於它的政治特殊性和特異的社會狀況，即使澳門無本土政黨產生，但來自大陸境內的政黨如維新黨、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社會的政治活動卻異常活躍，與當時澳門深具影響力的華商代表的聯繫與互動尤其密切，對澳門近現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不過，甚少有研究從黨商關係視角展開研究，而這正是構成澳門政治發展史的重要部分。因此，本文提出的研究問題是：澳門華商如何與活躍於澳門社會的國內政黨發生關聯？進一步地說，澳門華商與政黨展開互動的關係網絡如何建構起來的？

本文將重點截取新中國成立之後為時間段，以這個時期澳門華商代表何賢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互聯互動為切入點，探析政黨與華商之間互動形成的“黨商關係”及其建構的網絡結構。本

作者簡介：方木歡，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政治學博士。廣州 510275

文之所以選取澳門華商代表何賢作為研究對象，<sup>①</sup>是因為在澳門回歸祖國前，其政治表現相當活躍，無論在澳門還是在內地，具有較強的政治影響力。何賢從1955年起就擔任華人代表，在立法會改制後繼任為華人議員。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新政權之後，他從1956年起開始擔任全國政協委員。自1975年起，他連續三屆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並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職務。在澳門，他還擔任中華總商會會長、鏡湖醫院慈善會主席等職務。因此，以澳門華商代表何賢為例，分析他與中國共產黨組織及其領導人的互動，能夠為本研究提供相對豐富的經驗支撐。

## 一、澳門華商與內地政黨的關係發展

晚清以降，澳門一直不缺政黨組織的活動，它們的存在與發展需謀求澳門華商的支持與協助，而它們確實取得當時在澳門政治、經濟領域深具影響力的華商的支持與協助。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澳門華商與不同的政黨組織之間發生過重要的聯繫：清末澳門華商何廷光與維新黨建立合作關係，民國時期華商代表盧廉若積極參與國民黨的組織活動，在抗戰時尤其在新中國成立後華商代表何賢協助中國共產黨在澳門進行革命活動及投入到國內社會主義建設而構建起多層次的互動網絡。

抗戰爆發後，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深知澳門具有內外溝通聯絡的特殊價值，而且眾多澳門華商家族可以提供雄厚的資金資助和有利的政治支持，兩個政黨都在澳門設立與發展組織以加強在澳門活動，國民黨在澳門設立澳門支部秘密開展黨務工作，抗戰勝利後就在澳門公開活動。而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一直以秘密隱蔽的方式活動在澳門，曾設立歸中共香港分局指導的中共澳門工委，從事組織發展、民眾動員等工作。<sup>②</sup>當時，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力量相對薄弱。

何賢從1938年底經香港遷居到澳門，在20世紀40年代中憑藉其個人事業在澳門崛起，並逐漸在澳門社會中形成影響力。在中國革命戰爭的年代，何賢與活動於澳門的中國共產黨人有不少來往和聯繫，尤其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後，轉向成為中國共產黨堅定的支持者和擁護者，積極主動地配合協助中國共產黨人在澳門的政治活動及其黨務工作。何賢與傾向於支持中共政權的澳門愛國華商如馬萬祺、崔德祺等人一起，把人力、物力、財力貢獻和投入到中國共產黨人開展的革命運動與社會主義建設中。由此追溯，澳門近現代史上不乏政黨的政治身影，其與華商的互動聯繫對澳門政治發展具有不平常的影響。

為探析澳門歷史上的黨商關係及其互動網絡運作，本文以何賢為代表分析解放後澳門華商如何積極主動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多向互動，從而影響澳門政治歷史的發展與走向。

<sup>①</sup> 研究何賢的傳記著作有趙榮芳：《何賢生平》，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中山文史》（廣州）1990年總第19輯；關振東、陳樹榮：《何賢傳》，澳門：澳門出版社，1999年；劉克剛：《澳門特首何厚鏞》，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吳楠：《何厚鏞家族傳》，廣州：廣州出版社，2000年；由公：《澳門特首何厚鏞》，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9年；黃子雅：《何賢與我：形影的生活》，澳門：星光書店有限公司，2005年；陳冠任：《何氏父子》，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年；黃霽：《數風流人物》，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2年。

<sup>②</sup> 吳志良、婁勝華、何偉傑：《中華民國專題史（第十八卷）：革命、戰爭與澳門》，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03—260頁。

## 二、解放後何賢與中國共產黨的多向互動

1949年11月20日，澳門同胞慶祝新中國成立、廣州解放暨勞軍大會在何賢經營的澳門平安戲院隆重舉行。當時各界代表何賢（鏡湖醫院慈善會主席）、黃健（新民主主義協會代表）、梁培（工聯總會代表）等相繼演說，呼籲全澳門同胞團結起來，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這次大會向毛澤東主席和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葉劍英發致賀電，內容大致如下：

毛主席、朱總司令：中國人民革命，在你們正確領導之下，粉碎了蔣美，獲得了基本勝利。我們今天特舉行勞軍大會，萬眾一心，向你們致崇高敬禮，堅決接受你們的領導，支持解放戰爭，並為祖國的一切建設而努力。廣東省人民政府葉主席暨解放軍戰士：我們今天舉行慶祝和勞軍大會，一致向你們致敬，堅決支援解放戰爭，肅清國特匪幫，擁護新廣東建設。<sup>①</sup>

由此可知，何賢與中國共產黨已然建立密切的互動關係。從歷史來看，何賢主要是從中共駐澳負責人、中共中央港澳負責人和中共高層領導人三個層次結構展開互動的。

### （一）與中共駐澳負責人的交往

柯麟是何賢在澳門直接接觸的第一個共產黨人。柯麟是中國共產黨傑出的地下工作者，著名的醫學教育家。<sup>②</sup>1935年9月12日，中共為與居住在澳門的葉挺保持聯絡，派在香港開設西藥房的地下黨員柯麟遷居澳門，由柯麟擔任葉挺的“保健醫生”，並精心照顧葉挺一家的生活和健康，中共的指示也得以及時地由柯麟傳達給葉挺。<sup>③</sup>初到澳門，柯麟就在澳門板樟堂前街開診所開展活動。何賢與柯麟的相識是經過幾個人的牽線搭橋才得以完成。當時，柯麟是經寓居澳門的國民政府前廣東省財政廳長馮祝萬的引介，與當時滯留澳門的商人馬萬祺認識，<sup>④</sup>後通過馬萬祺的介紹，柯麟認識了何賢、林炳炎、崔德祺等澳門工商界重要人士。<sup>⑤</sup>柯麟和何賢在澳門社會事務中進行諸多合作，成為相知相識的好友。

可以說，何賢與中國共產黨建立聯繫，始於認識柯麟。當時何賢直認不諱對他帶來最大影響的是柯麟，他對柯麟有較好的評價：“他這個人做事非常認真，好重視在鏡湖醫院的工作，他為醫院，都不知道看少了多少個他自己診所的病人……他從沒有向我灌輸過任何思想，抑或是向我講過共產黨如何如何，不過他的為人態度，實在令我敬重。”<sup>⑥</sup>何賢在柯麟鼓勵下於1945年加盟鏡湖醫院，擔任鏡湖醫院慈善會值理，在1946—1947年期間擔任該會副主席。柯麟在何賢、馬萬祺等人的協助下圍繞鏡湖醫院及其他社團開展改革活動。柯麟也幫助何賢等人打入澳門中華總商會核心圈，支持何賢、馬萬祺等澳門愛國人士爭奪澳門中華總商會的領導權。何賢積極支持成立

①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2—173頁。

② 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年，第208頁。

③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澳門編年史（第五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38頁。

④ 馬萬祺曾於1942年秋賦詩首《欣喜結交柯麟醫生》以記錄他當時與柯麟認識的情況：“懸壺濟世良醫意，救國憂民志士志。有幸逢君爭早晚，難能相遇論當今。”參見謝常青箋釋：《馬萬祺詩詞選》，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8頁。

⑤ 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58—359頁。

⑥ 黃霽：《數風流人物》，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2年，第365—366頁。

澳門中華民主婦聯會，使婦女聯合會發展成為一個擁有一萬名會員的社會團體。<sup>①</sup>何賢也積極參與創辦《澳門商報》，便於在澳門的中國共產黨人向澳門華人社會宣傳中共政策，但由於澳葡當局的阻撓，《澳門商報》改為小報《新園地》在澳門出版，由何賢出任擔保人。

柯正平也是何賢在澳門進行相互合作與支持的共產黨人。柯正平作為中共在澳門的最高代表，在澳門工作六十多年，他的工作、生平猶如一部澳門近代史書。<sup>②</sup>但是，對柯正平在澳門具體事蹟的研究，目前沒有出現系統性的、專門的回憶錄、傳記或是論文，甚至在官方公開的資料中也是相對簡單，只能在相關論著中覓得。事實上，柯正平從20世紀40年代踏足澳門直至他於2005年在澳門逝世，他見證並幾乎參與了澳門的整個政治發展過程，其革命活動與澳門華商特別是何賢、馬萬祺等人有密切聯繫。

經柯麟介紹，柯正平與馬萬祺成為了志同道合的好友。通過馬萬祺介紹，何賢認識柯正平，並也成為好友。柯麟調回廣州後，其黨內工作由柯正平接替。1946年，柯正平就與馬萬祺進行商務合作，在澳門議事亭前地創辦新中行，由柯正平出任經理。1949年9月，為配合國家經濟恢復與發展，柯正平注冊成立澳門南光貿易公司。1950年柯正平辭去新中行經理之職，出任南光貿易公司總經理。柯正平退出後，何賢受邀加入新中行，新中行就交由馬萬祺和何賢經營。<sup>③</sup>後來，柯正平創建的南光貿易公司除了作為中國外貿部駐澳門的代表機構之外，還在政治上作為中國政府派駐澳門的代表。南光貿易公司創辦到1984年6月底，董事長職務一直由柯正平擔任，後改制成立為南光（集團）有限公司，仍由柯正平擔任董事長。<sup>④</sup>1987年，澳門南光公司正名為新華通訊社澳門分社，而貿易部門則發展成為澳門南光（集團）有限公司，業務亦向多元化發展，成為香港華潤（集團）有限公司的姊妹機構。<sup>⑤</sup>柯正平作為南光貿易公司一直以來的負責人，是中共在澳門的高級發言人。<sup>⑥</sup>新中國成立後，柯正平與澳門的華商代表何賢、馬萬祺、崔德祺等人的往來更密切，在澳門發生的“中葡關閘武裝衝突事件”以及“一二·三事件”中，柯正平都參與其中，與何賢和馬萬祺相互協助與支持，取得多次勝利。

何賢逝世時，柯正平為治喪委員會主任，並致悼詞：“……何賢先生一貫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積極支持祖國四個現代化建設和家鄉建設，一貫關心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甚至不計個人安危得失，不惜日夜勞碌奔走，為調解各方的矛盾糾紛、促進各界的愛國團結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何賢先生愛國愛鄉，急公好義，樂善好施，待人熱情，和藹可親，是一位忠厚長者，他的逝世，使港澳工商界失去了一位長者，港澳各界同胞失去了一個親愛的朋友……”<sup>⑦</sup>他對何賢的一生給予了高度恰當的評價。何賢助手崔樂其憶述：“何賢慣常在喝早茶後，約同馬萬祺至南光

① 魯陽、卓大宏：《柯麟傳》，澳門：澳門國際名家出版社，1993年，第114—115頁。

② 《不能忘記澳門的柯氏二兄弟——柯麟與柯正平》，廣東省柯麟醫學教育基金會，<http://news.foundationcenter.org.cn/html/2011-03/21844.html>。

③ 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32—133、193頁。

④ 《南光四十年紀念特刊（1849—1999）》，澳門：南光（集團）有限公司出版，1989年，第49頁。

⑤ 夏泉、董綿編：《馬萬祺研究資料匯編》，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4頁。

⑥ 《馬萬祺訪問記》（1985年7月29日），載李炳時：《澳門八十年代》，澳門：澳門出版協會，2013年，第345頁。

⑦ 趙榮芳：《何賢生平》，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中山文史》（廣州）1990年總第19輯，第92—93頁。

公司找柯正平聊天，遇有重大事件更詳加商討，費盡心思。”<sup>①</sup> 崔樂其認為澳門能夠順利回歸，柯正平、何賢和馬萬祺三人功不可沒。1999年，在新華社澳門分社舉行慶祝建國50周年國慶酒會上，柯正平邀請馬萬祺、崔樂其、彭彼得合影，以此為數十年並肩作戰的難忘歲月留作紀念。柯正平意味深長地說：“可惜何賢已不在世，否則這張合照更有意義。”<sup>②</sup> 由此可見，何賢在風雨飄搖的年代與中共駐澳第一負責人建立了誠摯友情，他們在澳門事務上的配合，影響着澳門政治的發展進程。

柯麟與柯正平先後作為中共駐澳負責人，他們對生存和發展於澳門的華商的政黨取向與政治抉擇影響深遠，他們是澳門華商何賢等人與中國共產黨進行互動的直接接觸者和首要合作者，甚至有研究者將柯麟比喻為是“串聯三大家族（何賢家族、馬萬祺家族、崔德祺家族）的紐帶”。<sup>③</sup> 當然，何賢、馬萬祺等人作為澳門具有影響力的華商代表也願意利用他們的力量，積極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成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和建設時期的熱心同志和愛國人士，不是共產黨員卻勝似共產黨員。<sup>④</sup> 正因澳門華商何賢、馬萬祺等積極主動尋求與中共聯繫與接觸，為中共革命和建設事業及澳葡政府與中國政府的溝通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從而得到活動於澳門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信任。

## （二）與中共中央港澳負責人的聯繫

廖承志、葉劍英作為當時中共中央港澳負責人，也是與何賢多有聯繫。廖承志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是中央港澳工作方面的資深領導者。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政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國際聯絡部副部長。1978年起任國務院僑辦主任、黨組書記，並兼任1978年從國務院僑辦分拆成立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sup>⑤</sup> 從廖承志經歷來看，作為中共中央港澳事務的主要負責人，他應與澳門華商有所互動。而從歷史事實看，澳門華商確實與以廖承志為代表的中央港澳事務負責機構進行了密切的接觸與聯繫。

在引發中葡外交危機的幾次重大衝突中，廖承志作為中央港澳工作主要負責人，全程關注事件的發展進程和參與處理。由於需要有在澳門有影響力的人士作為溝通和聯絡的橋樑，澳門華商代表何賢、馬萬祺等人成為合適人選，必須與他們建立聯繫與接觸機制。正由於何賢在中葡兩國之間的矛盾衝突中出色地完成任務，對維護中國國家利益以及澳門地區穩定發揮重要作用。對於廖承志請求交辦的事，何賢總會利用他在澳門的資源和人力盡力辦好。何賢曾談到廖承志：“廖承志這個人，胸襟廣大，是真正做事的人才，而且有魄力。肯幹，敢擔責任……還有一個特別的

① 劉品良：《澳門博彩業縱橫》，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2年，第151頁。

② 劉品良：《澳門博彩業縱橫》，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2年，第151頁。

③ 夏泉、劉詩悅：《柯麟研究的現狀與展望》，《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3期，第128—132頁。

④ 由於馬萬祺經常接觸中共黨人，曾向柯麟提出入黨請求。經黨組織討論後，由潘漢年向馬萬祺本人回覆，認為“在港澳這個特殊的社會環境中，進行愛國民主運動，進行革命鬥爭，馬萬祺同志留在黨外要比加入黨內的影響更大更好。我個人也認為這樣的決定完全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是使馬萬祺同志發揮更大作用、影響更好的需要。這個意見我們也向上級反映了，亦得到上級的贊同。我們把馬萬祺同志當自己人看待，會更加信任、更加尊重。”馬萬祺亦表示衷心尊重中共組織的決定，自覺地做一個黨外同志，為新中國，為港澳的未來，為社會主義奮鬥。參見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62—164頁。

⑤ 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年，第408頁。

地方，這個人跟別人沒有仇，不講人壞話，絕不會詆毀他人。”<sup>①</sup>因為廖承志一生注重港澳同胞的統戰工作，與港澳同胞建立了匪淺的交情。廖承志逝世時，何賢與馬萬祺合寫一個輓聯以表達敬意和哀悼：“世代忠良表，英華一旦凋。痛心何可了，矢志報天驕。”<sup>②</sup>

20世紀40、50年代及改革開放後，葉劍英也是中共中央港澳事務工作的關鍵人物。1949年10月廣州解放，當時解放軍根據中央政策方針，沒有乘勝追擊收復港澳。對於港澳工作的具體事務，中共中央交由葉劍英領導的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負責。在澳門，當時設立的中共澳門分常委，直屬港澳工委領導，而港澳工委的上級則是葉劍英為第一書記的華南分局。中共在澳門的組織在20世紀50年初已半公開化，當時澳門分黨委的對外活動由柯正平負責，澳葡當局也承認柯正平是新中國政府在澳門的代表，由柯正平負責澳門僑務，向葉劍英匯報。<sup>③</sup>直到1953年，葉劍英被調到北京，負責國防和軍隊建設工作。

解放初期，葉劍英重視對澳門同胞的統戰工作。1950年組織了以澳門知名人士黃長水為團長、馬萬祺為副團長的觀光團回國考察，對馬萬祺言道：“我們是老朋友了，這些年你為祖國做了好事，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sup>④</sup>他鼓勵支持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推動廣東經濟發展，1950年1月華南分局在廣州召開首屆廣東各地黨代表會議，葉劍英就提出“爭取港澳工商界及各地華僑資本家回國投資，從事新廣東的建設工作”。他要求財經委員會給出計劃，制定優惠政策，使港澳僑胞、華僑有投資目標。在葉劍英的大力支持，於1951年2月由何賢、馬萬祺、蟻美厚等港澳與海外華僑投資在廣州成立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為全國第一家吸收華僑和港澳商人投資的公私合營公司。他還與澳門同胞共同合作應對中葡矛盾，在中葡兩國發生“關閩武裝衝突事件”後，葉劍英立刻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他引用毛澤東的話：“在處理與這些國家的關係時，要區別對待，大國從嚴，小國從寬，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以集中力量對付主要敵人……”提出“對關閩事件的處理，應該把握從寬的原則”。在葉劍英的正確處理下，通過何賢、馬萬祺的斡旋，“關閩事件”得以和平解決。<sup>⑤</sup>

1978年葉劍英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更積極推動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統一戰線建設，支持利用廣東鄰近港澳的地理優勢和華僑眾多的有利條件，贊成經濟特區的設立和建設。在新時期，葉劍英就提到要合理地利用港澳同胞對社會主義現代建設的熱情。<sup>⑥</sup>葉劍英多次會見何賢、霍英東、馬萬祺和曾憲梓等港澳知名華商，爭取他們為統一祖國和支援祖國建設事業出力。<sup>⑦</sup>在澳門方面，葉劍英與何賢、馬萬祺之間的交往非同一般。在《葉劍英年譜》中，發現葉劍英曾多次接見何賢等人：

① 黃霽：《數風流人物》，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2年，第361頁。

② 參見馬萬祺：《為人師表》，載中國新聞社編：《廖公在人間》，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第180—182頁；吳躍農：《廖公情懷：廖承志與海外僑胞、港澳臺同胞交往紀事》，《海內與海外》（北京）1999年第11期，第4—10頁。

③ 湯家玉等：《葉劍英與澳門和平回歸》，《黨史縱覽》（合肥）2009年第12期，第4—8頁。

④ 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07頁。

⑤ 陳雷剛：《葉劍英與香港、澳門的不解之緣》，《黨史縱覽》（合肥）2015年第7期，第4—8頁。

⑥ 葉劍英：《利用一切有利條件，加快廣東建設步伐》，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葉劍英在廣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517頁。

⑦ 《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416頁。

1、1979年11月6日至12月18日，在廣州調查研究和休息期間，會見了澳門知名人士何賢、馬萬祺、柯正平。

2、1980年，會見澳門何賢、馬萬祺，並向他們贈送其詩集《遠望》。

3、1980年4月28日，在珠海會見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何賢及夫人，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馬萬祺及夫人、澳門南光公司負責人柯正平及夫人。

4、1981年3月視察廣東省珠海市和中山縣期間，在中山賓館會見了港澳知名人士霍英東、何賢、柯正平、何鴻燊。<sup>①</sup>

早在1977年4月17日，何賢和馬萬祺就前往北京向葉劍英等中央領導匯報澳門社會對打倒“四人幫”的情況，並請示往後的工作方針，葉劍英指出“澳門同胞是愛國的，愛國不分先後，你們要做好團結工作，團結更多的人”。同時，葉劍英設宴款待何賢與馬萬祺。為此，馬萬祺曾填詞《歡樂宴葉帥賜宴》，序曰：4月17日承葉委員長的接見本人及何賢理事長，並蒙設宴款待，填此詞以志不忘。<sup>②</sup>可以看出，澳門這些有影響力的華商與葉劍英建立了重要的聯繫。1983年何賢逝世後，葉劍英親自向澳門何賢的親屬發去唁電，對何賢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sup>③</sup>

### （三）與中共高層領導人的接觸

以何賢為代表的澳門華商不僅與中共駐澳負責人和中央港澳事務負責人進行交往與聯繫，同時也與中共高層領導有所接觸。

1955年何賢受中央人民政府邀請回國觀光。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設宴接見何賢等港澳觀光歸國人士，觀光團受到高規格和熱情的接待。宴會之後，周恩來曾與何賢進行交談。<sup>④</sup>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全國政協作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仍將存在，並繼續發揮統一戰線的作用。當時針對有人提出第二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名單中甚麼人都有的意見，周總理指出：“我覺得好處就在這裏。政協不是一盆清水，如果是一盆清水就沒有意思了。政協就是要團結各個方面的人，只要他擁護憲法，立場站過來，我們就歡迎……我們要吸收不同意見的人在一起，要善於和這些人一起協商，團結他們。這樣，政治協商會議才能前進，才能有利於國家建設。”<sup>⑤</sup>於是，在1956年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召開前夕，何賢與柯正平由廣州前往北京時受到周總理的接見，周總理提議邀請何賢作為特邀委員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何賢接受了建議。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何賢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改革開放後，何賢與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也有所接觸。1983年6月25日，鄧小平會見出席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港澳地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並向他們發表了講話。<sup>⑥</sup>當時，何賢已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人大常委。

在國家領導人當中，何賢與時兼任外交部長的周恩來總理互動更多。周恩來之所以關注以何賢為代表的澳門華商，在他1957年關於中共統一戰線的一次講話中可明白一二：“港澳的同胞不

① 劉繼賢主編：《葉劍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181、1182、1187、1198頁。

② 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16—317頁。其詩云：“歡樂宴，舉酒乾杯歡欣遍，萬眾同心願。恭祝老帥長壽，再頌國家強盛，三願宏圖早實現。壯志如虹練。”

③ 劉繼賢主編：《葉劍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227頁。

④ 陳冠任：《何氏父子》，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年，第36—37頁。

⑤ 力平、馬芷蓀：《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429頁。

⑥ 《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915頁。

要擔心前途。他們當中如果有些人主動堅決要求回來，可以同意。但不要動員他們回來，要讓他們留在那裏經營自己的企業。我們可以同他們內外合作，不使人吃虧……凡是有愛國心的人，我們就歡迎。”<sup>①</sup>而何賢對周恩來總理甚為尊重，曾提到，“古今中外，任何國家主要負責人，那麼以國家為重，完全不為意氣，不管大小事，絕對沒有任何私心的，我看都只有他（周恩來）一個了……他（周恩來）亦不是一朝一日就這樣的。我從五十年代，同他見面，一直到他逝世前幾個月，他都是這樣的。每次我回到大陸，他知道我到北京，必然找我談問……他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決斷快，清清楚楚，而且好認真。”何賢便以1960年與周恩來一次會面為例，周恩來詢問何賢海關入口檢查情形。何賢如實反映當時檢查繁瑣複雜，導致回內地旅客耽誤太多時間，周恩來吩咐秘書找公安部和海關總署實地調查，改善檢查程序。<sup>②</sup>而基於何賢為處理中葡關係發揮的作用，以及他為澳門社會所作的貢獻，周恩來曾給予何賢的評價是：“在港澳，像何賢先生這樣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sup>③</sup>

### 三、積極支持中共新政權的澳門愛國華商

由於何賢在20世紀40年代末在澳門形成較大的影響力，具備充足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支持中共領導的新政權。新中國成立初，中國共產黨在港澳地區所歷經的不少政治事件中，何賢、馬萬祺等澳門華商都予以協助化解。

#### （一）辦慶典支持中共新生政權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柯麟、何賢、馬萬祺、柯正平和梁培策劃在澳門舉行各界人士參加的慶祝大會。但當時廣東附近仍有不少國民黨軍隊，澳門國民黨勢力也不小，澳葡政府因懼怕國民黨勢力而有所顧忌，何賢與馬萬祺、柯麟去見澳門總督柯維納（Albano Rodrigues de Oliveira），與柯維納展開一場既堅持原則又講策略的交涉，最終迫使當局同意舉行澳門慶祝大會。何賢與柯麟、馬萬祺召開籌備大會，各分其責，何賢負責場地選定，同時他認為開好首次慶祝大會，秩序和保安工作很重要，由其負責澳門政府和社會上的三山五嶽。<sup>④</sup>大會召開的同時進行募捐活動，組織方呼籲各界同胞踴躍捐獻，支援中國人民解放軍完成大西南、台灣解放的任務。當時各界同胞積極響應，共捐得12萬元的財物。何賢、柯麟、馬萬祺除發動港澳同胞支援進軍解放大西南和海南島外，多次組織澳門各界群眾到澳門石岐慰勞解放軍。1950年2月，馬萬祺率領由澳門各界160多人組成的慰問團前往中山石岐慰問，在代表澳門各界講話時表示擁護人民政府，擁護解放軍，向解放軍致敬：“解放軍打到哪裏，澳門同胞就支援到哪裏。”<sup>⑤</sup>此後，何賢、馬萬祺等人都會在總商會成立“澳門各界慶祝國慶籌備委員會”等組織，以宣傳國家的建設成就和響應祖國號召支持國家建設發展。

#### （二）解放戰爭與朝鮮戰爭時期搶送物資

1949年底廣東全省雖然大部分地区得到解放，但是海南島及南澳島、萬山群島還沒有獲得解

① 《關於香港問題》，1957年4月28日，《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4頁。

② 黃霽：《數風流人物》，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2年，第360—361頁。

③ 劉品良：《澳門博彩業縱橫》，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2年，第146頁。

④ 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78—182頁。

⑤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4頁。



放，盤踞着國民黨殘餘勢力，解放海南島及其他島嶼成為中共華南分局在1950的工作中心。<sup>①</sup>為支援解放軍解放海南島和萬山群島，柯麟根據黨的指示，與柯正平及何賢、馬萬祺等愛國人士一起，通過南光貿易有限公司及其他渠道，組織內地急需的糧食、五金、器材、汽油等應用物資，運回內地，支援大軍解放海南和萬山群島。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國際反華勢力宣佈封鎖中國沿海，禁止多項物資輸入中國，柯麟、柯正平等在葉劍英的指示下利用港澳同胞的力量，大力發展南光貿易有限公司的業務，承擔起為祖國進口急需物資的任務。<sup>②</sup>當時南光貿易有限公司“以特殊方式為國內當時特殊環境下採購一些特需物資，出口業務微乎其微”，<sup>③</sup>成為中國打破西方封鎖的主要通道。

影響較深刻的事件是“兩航起義”，何賢協助中共黨人將存放在澳門的大批物資運送到廣州。1949年11月9日，不願撤往台灣的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員工在總經理劉敬宜、陳卓林率領下宣佈脫離國民黨，並駕駛11架航機由香港飛回北京，是為“兩航起義”。早在“兩航起義”秘密籌劃中，中航通訊課的製造車間和器材因受港英法令限制，不能進入香港，於是從上海輾轉遷至汕頭、台南，最後遷到澳門。通訊課在澳門共有員工60餘人，運往澳門的設備和器材，是由柯麟通過何賢、馬萬祺把器材放在“信達”倉庫，準備運回祖國。可是在1950年，美國方面向澳門法院提起訴訟，妄圖凍結中航在澳門的財產。在這緊急關頭，中央派任泊生專程赴澳門，同時葉劍英寫信給柯麟，要求他設法把這批人民空軍急需物資運送到廣州來。柯麟接受任務後即找到何賢、馬萬祺，利用他們的關係，把存放在“信達”倉庫的全部器材搶運裝船運抵廣州。在各方面的配合下，這批通訊器材最終安全抵達廣州再轉運北上，為中國人民空軍加強雷達設備裝置發揮了作用。<sup>④</sup>

### （三）協助解決國內“吃糧”難題

1950年初廣東各地城鄉面臨春荒問題，在鄉村徵糧已很困難。國際上一些國家和國民黨勢力利用廣州鄰近的香港和澳門的條件，乘春荒之機伺機反撲，新中國面臨嚴峻考驗。當時，中共華南分局還進行着解放海南島的戰爭準備，解放軍需要大量的糧食。葉劍英同省、市政府負責人經過研究，決定發動城鄉人民，自力更生，節約用糧，渡過春荒。同時，設法從國外進口一部分糧食，以解決吃糧難危機。<sup>⑤</sup>

由於一些國家實行封鎖政策，周邊一些國家也尚未與新中國建交，故難以與他們開展貿易。葉劍英提出，利用民間渠道想辦法，與省政府商業廳長朱竟之、副廳長鄧文釗和僑委負責人伍治之等人，一起研究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葉劍英提出，“能不能利用一些歸國華僑在國外的關係，以別的名義將糧食買到，先運到香港，再設法轉來廣州？”該提議得到鄧文釗贊同，並推薦蟻美厚等人來辦這件事。蟻美厚是泰國華僑，在泰國主要經營船務和進出口貿易。他同情支持國內的人民革命鬥爭。1949年6月他被邀請回國準備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10月底回到廣東。葉

① 葉劍英：《1950年廣東的艱巨任務》，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葉劍英在廣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92—98頁。

②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0—181頁。

③ 《南光四十年紀念特刊（1849—1999）》，澳門：南光（集團）有限公司，1989年，第48頁。

④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0頁。

⑤ 中共華南分局一份報告顯示，當年廣東春寒特甚，是六十年來最冷的一年，農民冬季作物如番薯之類，收成只有三成，種子被凍壞的多至四成，春荒相當嚴重，餓死人的現象連續發生。組織群眾戰勝災荒，是目前刻不容緩的一個政治任務，在我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不允許再有餓死人的事件發生。參見劉繼賢主編：《葉劍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602—603頁。

劍英當即找到蟻美厚，詳細詢問其在國外的經營業務，然後說道：“這件事情需要你出力，具體辦法還要仔細研究。總之，一是要快，二是要穩妥。廣州的人民需要這批糧食。”蟻美厚欣然領命。他趕到香港，通過長途電話讓在泰國的家人購買一批大米，然後通過五福輪船公司轉運至香港、澳門。經過一番艱難曲折，才將大米買妥並分批運抵香港、澳門兩地。接着，又經過何賢、馬萬祺和柯正平等入設法在1950年春將大米運到廣州。<sup>①</sup>那時正是青黃不接之時，又趕上解放軍準備解放海南島，軍隊、地方都需要大量糧食。從外國購買的糧食運進來之後，一部分供應給城鄉群眾，一部分供應給進軍海南島的解放軍部隊，緩解了糧食供應方面的困難。

#### 四、何賢家族兩次危機與中共黨組織的解圍

由於何賢與中國共產黨的互動，以及他協助和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在何賢其家族事業面臨的兩次經濟危機中，中共黨組織都通過中資銀行予以資金支持，將其解救出困境。

一是在地產危機中，中共政權控制的中資銀行助力何賢走出困境。20世紀50年代地產業是香港的新興行業，香港建築商李康節為加入香港地產行業，邀請港澳兩地多家商人如何賢、霍英東組成聯合公司發展地產業，由李康節本人掌管，他極力擴張幾乎獨霸香港北角的地產生意。但由於港英政府出台限制出售“樓花”政策條例，以及香港樓市的虛假繁榮現象，爆發了房地產危機，香港不少地產公司瀕臨破產的境地。而李康節創建的聯合地產公司也因大量搶購地盤和擴張過度，最終導致合夥人因負債累累陷於困境。如霍英東所言：“由於李康節搞得不好，最後拖累了他，恒生銀行逼他還錢。何賢本來投入不多，但這間聯合公司的不少借貸都是由何賢簽字擔保的，搞得何賢一身債，最後還是周恩來總理出面，安排中資銀行出資幫何賢渡過難關。”<sup>②</sup>

二是大豐銀行發生擠兌，中共領導通過中資銀行支持何賢控制的大豐銀行渡過危機。1983年何賢因病赴美國治療，引致外界很多猜測，造成個別大豐的存款大戶將幾千萬元存款提走，繼而引起中小存戶的疑懼，造成存戶擠提現象。馬萬祺向柯正平反映問題，柯正平立即向中央領導報告，並得到中央領導的答覆，專門給澳門中國銀行下達指示：何賢為國家辦了很多好事，且歷經數十年，今天他的家族生意遇到困難，我們應該幫他一把。馬萬祺又向澳督高斯達（Vasco Leote de Almeida e Costa）反映，高斯達亦表示支持大豐銀行，並先命令金融部門撥款予大豐銀行應急。澳門中國銀行瞭解大豐銀行的資產負債情況，立即宣佈全面支持大豐銀行，擠提風潮得到解決。<sup>③</sup>事後，中國銀行接受何賢提出中國銀行參股大豐銀行的建議，注資百分之六十，並接受大豐銀行董事會委托派負責人參與管理。同時，何厚鐸也被任命為常務董事兼總經理，與代董事長何厚鏗共同參與大豐銀行管理。何厚鐸在一次接受訪談時，坦誠道：“我今日坐（大豐銀行）總經理這個位，以我的年紀和經驗，若是經過正常程序是不可能坐得到的。主要是大豐本身的一些特點，另一方面，同中銀集團合作之後，他們亦很看得起我，給我機會坐這個位來學習。”<sup>④</sup>

① 來源於1986年11月葉劍英傳編寫組訪問蟻美厚的談話記錄，參見《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266—267頁。在王俊彥的《廖承志傳》著述中，作者記述的是由廖承志負責聯繫知名華僑蟻美厚解決糧食問題，似是出現作者替文中主人公“爭功”的問題，本文主張採用葉劍英傳編寫組的說法。

② 霍英東口述；冷夏著：《時局的生意：霍英東自述》，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59—62頁。

③ “大豐銀行擠提事件”具體情況，參見陳冠任：《何氏父子》，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年，第214—223、230頁；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56頁。

④ 《與何厚鐸一席談》（1985年8月15日），載李炳時：《澳門八十年代》，澳門：澳門出版協會，第352—353頁。

## 五、何賢與中共關係對澳門華人社會的影響

正是因為以何賢為代表的澳門華商與中國共產黨的緊密聯繫與交往，他們在與澳葡政府打交道、立法會運作、維護秩序穩定、社會民生保障等方面，對澳門華人社會產生了重要而積極的影響。

### （一）代表華人社會向澳葡政府發聲

由於何賢在新中國所獲得的影響力與威望，使其在1955年以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的職務被澳門總督正式委任為華人代表。自此之後，何賢擔任華人代表一職長達20年之久，是歷任華人代表任職最久的一個，直到1976年澳葡政府實行政治改革廢除“華人代表”的職務為止。何賢任職華人代表之後，在新馬路大豐銀行二樓設立“澳門華人代表何賢辦事處”，並規定每天上午九點至十點作為接待市民時間，以方便市民辦理政策諮詢、意見表達及跟進申訴等事宜。即使有許多不屬於他的處理範圍，他也會幫市民向澳門總督舉諫，或是代為向政府部門反映，為市民爭取滿意的答覆或結論，從而為澳門居民做了許多實事。<sup>①</sup>

### （二）澳葡立法會中代表華人社會的中堅力量

1976年澳葡政府頒佈《澳門組織章程》，成為當時澳門法律體系中最基本的法律，是澳門政治、行政、財政、立法組織運作的根本依據，澳門管理機關因而分為總督、立法會，及會同總督運作的諮詢會。立法職能由立法會和總督行使，執行職能由總督行使，並由政務司協助。立法會由此成為澳門地區名符其實的立法機關，不再從屬於總督。當時，立法會由17名議員組成，其中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各6名，另外5名由總督進行委任。1990年4月修改《澳門組織章程》後，立法會議員人數增加到23名，其中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各8名，另外7名由總督進行委任。<sup>②</sup>從1976—1999年澳葡政府歷屆立法會組成人員來看，何賢在第一屆（1976—1980）、第二屆（1980—1984）中被澳門總督委任為立法會議員，並擔任第二屆立法會副主席，1983年逝世後由崔樂其替補。在此期間，何賢承擔了立法會常設委員會委員、公共行政暨市政事務委員會委員、治安高等委員會（第二屆改為“治安最高委員會”）委員等職務，<sup>③</sup>成為立法會中華人社會的中堅力量，替華人群體表達利益訴求與爭取正當權益。

### （三）力所能及地維護澳門社會穩定

在解放後，正因何賢獲得中共高層的信任與支持，使其在中國政府與澳葡政府之間建立了穩固的政治關係。從20世紀50年代起，何賢在中葡兩國之間的衝突矛盾或是協作配合中扮演了聯絡者與協調人的重要角色，對維護中葡兩國正常關係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美國實行禁運以封鎖新中國、葡萄牙與台灣國民黨保持外交關係、中葡界限歷史上一直未劃清的情況下，中葡兩國之間爆發了幾個衝突和矛盾，在近代史影響較為深刻的是1952年的“關閩武裝衝突事件”、<sup>④</sup>

① 參見趙榮芳：《何賢生平》，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中山文史》（廣州）1990年總第19輯，第69—70頁；吳楠：《何厚鐸家族傳》，廣州：廣州出版社，1999年，第143—150頁。

② 吳志良：《澳門政制》，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96年，第61—62、93、97頁。

③ 古維傑編：《澳門立法會成立二十周年（1976—1996）》“附錄”，澳門：澳門立法會，1996年，第36—43頁。

④ 對1952年關閩武裝衝突事件的敘述，不少歷史著作對其都有記載。本文主要參考新華社廣州1952年8月25日電，載廣東檔案館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第158—159頁；謝後和、鄧開頌：《澳門滄桑500年》，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61—264頁。

1955年的“澳門開埠400周年慶典事件”，<sup>①</sup>以及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sup>②</sup>在這些衝突事件中，都呈現了何賢奔走於兩國政府之間的身影。當時以何賢為代表的眾多澳門華商，憑藉其在中葡兩國之間建立的關係網絡及從中所獲得的政治影響力，在兩國政府之間發揮了重要的協調和聯絡作用，從而維護了澳門社會秩序穩定，避免澳門陷入危險中。

#### （四）幫助解決澳門社會民生問題

何賢與中共領導人的密切關係，使其能夠與內地政府協商解決澳門社會民生問題，例如澳門的“鬧水荒”與“垃圾圍城”等難題。20世紀50年代末，隨着澳門工商、旅遊業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用水量逐年上升，境內的大水塘、石排灣、黑沙、青洲和路環水庫的存水量日漸難以應付枯水期的用水，導致澳門地區原水自給自足的局面難以維持，嚴重影響到澳門居民生活和經濟發展。<sup>③</sup>面對澳門用水緊缺問題，何賢與馬萬祺和柯正平緊急研究解決澳門缺水問題，決定致函廣東省人民政府請求解決。1959年，何賢等人面請廣東省委、省政府支持解決澳門的供水不足問題。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省長陳郁決定在珠海縣境內修建水庫引水進入澳門，與何賢、馬萬祺、柯正平等到中山石岐商談，議定由澳門自來水公司投資，中山縣負責出勞動力，在灣仔修築竹仙洞水庫引水供應澳門。<sup>④</sup>經國務院批准，1959年開始動工興建竹仙洞水庫和銀坑水庫，並於1960年3月和7月分別建成，每日向澳門的供水量為8,200噸，基本滿足了當時澳門居民的用水需求。<sup>⑤</sup>1974年，何賢接管澳門自來水公司，在1979年親自與珠海政府商談並達成協議，將香洲大鏡山、梅澳兩座新建的水庫的水輸入澳門，解決生活用水和工業用水急增的問題。<sup>⑥</sup>

1969年之前珠海曾為處理來自澳門的垃圾建有夏灣和灣仔兩個肥料廠，但在1969年隨着停止澳門進口垃圾而停辦。於是澳門將每天清除的垃圾堆放於青洲一帶，不到3年時間就臭氣沖天、蚊蟲叢生，不僅嚴重影響澳門居民的身體健康，也直接影響拱北地區軍民身體健康。由於澳門地方小，無法另找堆放的地方。在1972年5月29日，澳葡市政廳長歐若堅（Joaquim Morais Alves）

① 參見《“開埠慶祝程序”的取消》，《人民日報》1955年10月26日。

② 關於澳門歷史的諸多著作都對該事件的發生過程進行了記載，參見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14—2125頁；黃慶華：《中葡關係史（1513—1999）》（下冊），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第1100—1123頁；廣東檔案館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第170—190頁；謝後和、鄧開頌：《澳門滄桑500年》，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66—274頁；黃鴻釗：《澳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0—372頁；吳志良：《澳門政治發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233—65頁。

③ 1958年11月至1959年3月澳門發生嚴重乾旱情況，澳門總督白覺理（Pedro Correia de Barros）和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總裁暨市政廳行政委員會主席Pedro Hyndman Lobo，就通過請求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何賢作為中介人，參與了與中國政府的談判，從中國大陸輸入食用水並實施配給供水。參見Moises Silva Fernandes：《1949—1966年間葡中關係概況》，《行政》（澳門）1998年第40期，第532頁。

④ 參見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46頁；謝後和、鄧開頌：《澳門滄桑500年》，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84頁；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4—248頁。

⑤ 1961年10月，由於澳門再次遭受嚴重乾旱，澳葡當局宣佈澳門境內發生霍亂瘟疫，水供應不足是原因之一，澳葡政府被迫在1962年11月至1963年3月實行配給供水，而何賢則再次成為中介人，經總督羅必信（António Adriano Faria Lopes dos Santos）和澳門市政廳主席兼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總裁Pedro Hyndman Lobo的批准參加了與中國政府的談判，目的是要中國政府向澳門供應未加工處理的水。參見Moises Silva Fernandes：《1949—1966年間葡中關係概況》《行政》（澳門）1998年第40期，第539頁。

⑥ 趙榮芳：《何賢生平》，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中山文史》（廣州）1990年總第19輯，第24頁。

向何賢遞交一份正式信件，要求何賢轉向珠海縣設法代為解決垃圾出路問題。<sup>①</sup>根據澳門關於代為解決垃圾出路的請求，為保障澳門同胞的環境衛生，經珠海縣衛生局和何賢協商後，雙方就為協助清理澳門垃圾有關問題達成協議，由珠海縣出面同何賢領導的澳門中華總商會簽訂一個3年的協議書，在這期間珠海縣負責將歷年堆積的垃圾清理完畢，同時也將新產生的垃圾運走。而澳葡當局負責提供機動木船、膠帶運輸機等所需設備及其運費。<sup>②</sup>珠海縣為此適當地擴建夏灣和灣仔兩個肥料廠，將澳門地區產生的垃圾運入珠海縣肥料廠進行處理，增加珠海縣農業生產所需的肥料來源。在何賢領導的中華總商會與珠海縣的合作中，澳門垃圾問題得到大大地解決。

## 六、結語

綜上澳門華商與中國近代以來維新黨、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互動，實則是澳門近代政治發展史上的重要現象。何廷光在晚清時期較具影響力，維新黨要在澳門立足需要依重何廷光；到民初時期，國民黨則要獲得盧廉若家族的力量支持，這個家族亦幾乎傾盡全力支持國民黨的革命事業。基於歷史事實看，這些澳門華商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商人，這些華商家族除具備雄厚經濟基礎和充足的社會資源外，他們因與澳葡政府關係密切而在澳門政治具有話語權，這正是活動於澳門的國內政黨組織所不具備的，需要政黨與澳門華商展開互動以獲得立足於澳門的社會力量支持。

20世紀40年代末，以何賢為代表的澳門愛國華商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密切互動，由此建構起來的黨商關係網絡對澳門政治乃至國內政治中發揮重要的影響。何賢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者和擁護者，採取積極行動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與中國共產黨緊密互動，概括來說體現在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與中共駐澳負責人的交往，柯麟是何賢與中共黨組織發生聯繫的引路人與牽線人，柯正平從20世紀50年代初就成為中共在澳門的代表和發言人，是何賢與中共黨組織進行合作的直接接觸者和首要聯絡人；第二層次是何賢與中共中央港澳事務負責人的聯繫，表現在何賢與廖承志和葉劍英為代表進行的溝通聯繫。無論建國初期還是改革開放後，何賢用實際行動響應中共領導人號召，支持國家革命和建設事業；第三層次是何賢與中共高層領導人的接觸，他獲得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接見，更獲得周恩來賞識與肯定。正是從三個層次與中國共產黨構建起來的黨商關係網絡，使以何賢為代表的澳門愛國華商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澳門政治中獲得更大影響力，為他們在澳門與澳葡政府、華人社團、港澳商界構建廣泛的關係網絡提供重要支持。因此，研究澳門華商與政黨之間密切互動而形成的“黨商關係”，能夠為勾勒澳門在回歸前的政治變化縮影提供重要的歷史角度。

[責任編輯 陳超敏]

<sup>①</sup> 廣東省珠海縣革命委員會：《關於協助澳葡當局解決垃圾出路的請示報告》，1972年7月28日，廣東檔案館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196頁。

<sup>②</sup> 廣東省革委會辦事組外事辦公室：《關於協助清理澳門垃圾問題的報告》，1972年10月25日，廣東檔案館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193頁。